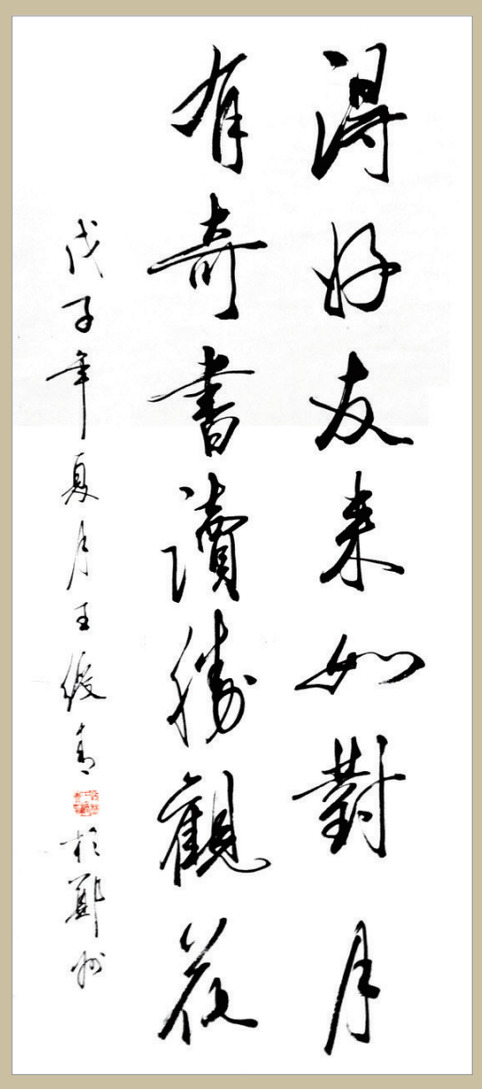
秀士仗剑 玉树临风

□武春河



欣赏王绶青的书法是一种美的享受。

王绶青的“书法美”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格调高雅。一幅书法作品摆在面前，首先看的是其格调高下。王绶青少年习书，取法乎上，从二王入门，进而研习欧、柳、米、黄，60多年间，在工作和文学创作之余，从未懈怠。故其书结体谨严，笔力劲健，骨气洞达，瘦硬而不失意韵，规矩而不失成法，全无江湖陋习与世俗气。观赏王绶青书法，常有日照青杨、风过竹林之感，沁心而爽目。

二是技法纯熟，笔画精到，传统功底深厚、扎实。这与他重视对经典的学习有关。书法家不是写字匠。但习书首先必须把汉字写好，不论真书还是行草书，都应依法度、讲规矩，不可信笔游走，胡乱涂抹。在把字写好的基础上，加以艺术化创造，才能成为真正的书法艺术作品。王绶青深谙此理，几十年来，以古为师，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如琢如磨，孜孜以求，终成自家面貌。

三是有浓烈的时代气息。王绶青的书法重继承，更重创新，追求“笔墨当随时代”，而非食古不化。固此，他的书法尽显当代人绰约风格，透着一股清新飒爽之气。

书法美是抽象的。但是一幅抽象艺术作品发出的文化信息能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书如其人”，书法家展示自己的作品，同时也展示出自己的“文化形象”——雅俗野逸，一目了然。王绶青通过其书法作品展露的“文化形象”用八个字来描述，应是“秀士仗剑、玉树临风”！

其实，这即是他自己——一位知名诗人的内心影像！

鉴赏

异彩纷呈的汉碑(下)

□刘 恒

北宋时期，在文人学者群体中兴起了一股搜集、研究古代碑文字的热潮，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到处搜罗埋没在荒山古刹中的残碑断碣，获得拓本后考证源流，记录碑文，品评书法，留下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有欧阳修的《集古录》、洪适的《隶释》、赵明诚的《金石录》等。同时，还有一些专门收集、研究古代青铜器物的学者及著作。两者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中国传统学术中一个重要门类——金石学。

宋代金石学的重要功绩之一，就是著录并保存了大量的汉代碑刻的记录及拓本。由于战乱损毁和自然侵蚀等原因，许多秦汉以来的碑刻都已湮没无闻。经过宋人的搜寻、传拓和著录，大量碑刻重见天日，成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化遗产。

宋代兴起的金石学经过元、明两代的延续，在清朝初期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繁盛的时期。清朝统治者在文化上的严酷政策，导致了文人学者大都转向远离时事、闭门研究古代文物的学术风气。当时，学术界盛行对汉代文献、文物的研究，治学方法以训诂考据为主，被称为“汉学”，而汉代的碑刻汉字也被视为可信无疑的真实史料而受到广泛的重视。这股风气从学术界扩大到书法界，许多书法家开始倡导学习汉碑、复兴隶书的实践。于是，以汉碑为主的古代碑刻拓本成为文人学者及书法家们争相搜集收藏的目标，并由此形成清代书坛的新潮流——碑学。

清代的碑学书法以研究汉碑、复兴隶书为发端。由于年代久远，许多汉碑都已经毁灭或湮没，因此，寻访和传拓隐没在荒冢残庙中的古代碑刻成为当时文人官吏普遍参与的活动，如乾嘉时期的黄易、翁方纲、阮元等人都利用自己在各地做官的机会，大量搜访汉碑。尤其是黄易，长期在山东、河南一带寻访古碑，不仅重新发现了《武斑碑》《武梁祠画像石》《熹平残碑》等一批汉碑，而且将拓片寄到北京，在翁方纲等学者间流传、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自己也撰写有访碑日记、访碑录等著作。另一位碑学研究的重要人物翁方纲则著有《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等著作。通过这些文人官员的影响和带动，散落在各处的汉碑也被集中起来加以保护，今天保存在山东曲阜、济宁等地的众多汉碑，就是那时集中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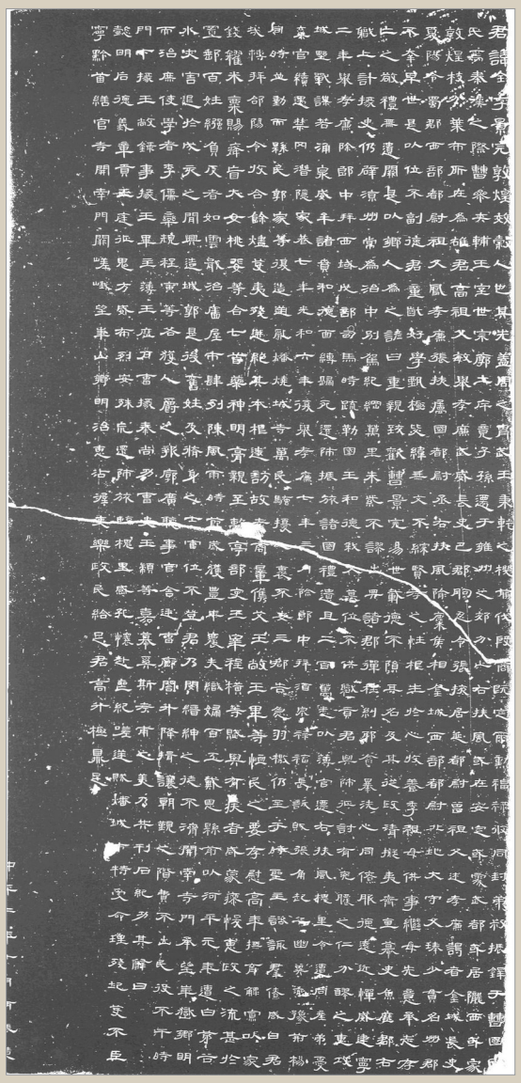
对于那些已经毁灭的汉碑来说，侥幸留存下来的拓本就格外珍贵了，特别是年代久远的宋拓或是孤本，更是价值连城，成为收藏家追逐的对象。因为古碑经过长期的雨摧风化、椎拓损伤等原因，即使原石尚存，不同时期的拓本在保存字数多寡和书法原貌方面差别很大，所以早期拓本尤以宋拓最为难得和宝贵。

比如赫赫有名的汉《西岳华山庙碑》原在陕西华阴华岳庙中，明代万历年间毁于地震。其原石拓本世间流传仅有四本，存字多少不一，都是宋、元时期所拓，名动海内。清代时这四本在不同收藏家之间流传，不论谁得到都视为珍宝，并邀请文人学者和书法名家考证题跋，以增声价。到清末，这四本《华山碑》中有三本都归于收藏家端方一人之手，傲视同侪，传为佳话。据统计，四本《华山碑》上的题跋多达230余条，涉及人物超过300个，清代中后期的著名文人学者几乎都在其中留下手迹，洵称瑰宝。

即使晚出的古碑，由于椎拓过度原石往往受损甚至毁坏，所以初拓、精拓也十分难得。如汉《曹全碑》于明代万历年间在陕西白水出土，后来搬运到西安，其间损角、断裂，完整的初拓寥寥无几，在碑帖收藏者间也是珍若拱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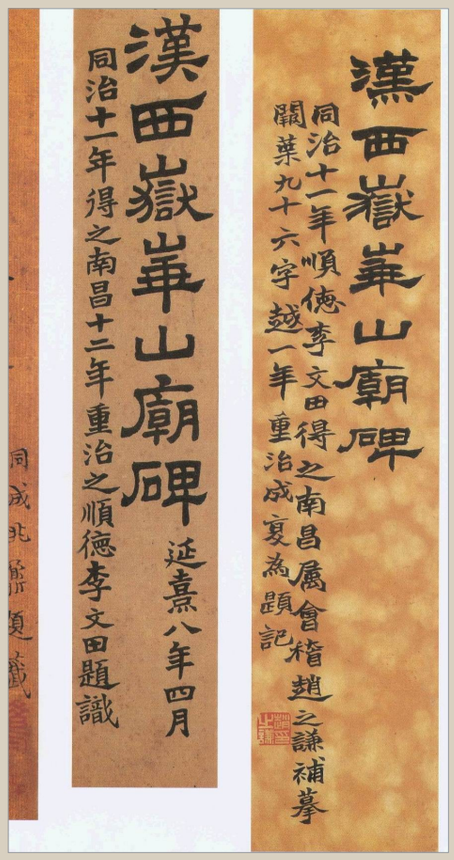
直到今天，汉碑不时还有新的出土发现，但出于文物保护的规定，新出土的汉碑极少有拓本流传，对于收藏者来说十分难得。而古旧拓本已日渐稀少，若是经过著名学者、书法名家收藏或题跋者就更是难得的珍品了。

《西岳华山庙碑》



《曹全碑》局部之一

《曹全碑》局部之二



《西岳华山庙碑》题跋

书桌上的瓦尔登湖

□马明博

仿佛有人在暗夜中的雪地上行走。沙沙的脚步声不时响起。偶尔停一下。想是那人走累了，找到一根卧倒的树或者一块冷冷的石头，打扫掉上面落满的雪花，一屁股坐下来，歇息一会儿。继而脚步声又起。一整夜，那人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夜，曾经真实、漆黑的夜。现在，它悄悄起身，要从窗外蹲守的地方跑开了。

雪地，大雪覆盖着的土地，是书桌上铺展着的宣纸。

那满怀心事的夜行人，尽管走了一夜，他也不会发出一星牢骚、半点埋怨。

因为“他”是一枝来自浙江湖州的毛笔。

胡庆恩手中握着这枝笔以小楷工整地抄出一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写下那么多蕴藉典雅的字，这枝笔却不喧哗，保持着内心的寂照。

时光如水，夜色如墨，以砚为湖，行走不歇。

“以砚为湖”，这个比喻，让我蓦地想到梭罗和瓦尔登湖。

形单影只的梭罗，告别城市，借来一柄斧头，来到瓦尔登湖畔，在孤独与寂寞中度过了700多个日日夜夜。他说：“大部分时间内，我觉得寂寞是有益于健康的。有了伴儿，即使是最好的伴儿，不久也要厌倦，弄得很糟糕。我爱孤独。我没有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同伴了。”“我并不比湖中高声大笑的潜水鸟更孤独，我并不比瓦尔登湖更寂寞。我并不比一朵毛蕊花或牧场上的一朵蒲公英寂寞，我不比一张豆叶，一枝酢酱草，或一只马蝇，或一只大黄蜂更孤独。我不比密尔溪，或一只风信鸡，或北极星，或南风更寂寞，我不比四月的雨或正月的融雪，或新屋中的第一只蜘蛛更孤独。”

梭罗享受着美好的寂寞，行走在瓦尔登湖周围。他发现，身边的那山、那水、那树，都是意气相投的朋友。

美国著名思想家爱默生曾这样描述，梭罗喜欢走路，并认为走路比乘车方便。因为乘车的话，你要先挣够车费，才能成行。再说，何况梭罗不仅仅把要到达的地方当作目的地，在他看来，行走本身也是目的之一呢。

渤海边，大洼地，寂寞、苍凉的莽野，胡庆恩在孤独地行走着。冬雪过后，寂寥广袤的大地，像铺展开的宣纸，信步其中，让人体会到天地没有边际的博大；而春来时，破土而出的苇芽，枝头爆出的一点鹅黄，出没在草丛间的灰鹭、野鸭，像信笔点下的墨点，让心涌现生之喜悦；伴随盛夏而来的一望无际的绿，风拂柳枝，连绵起伏，是一道道游走的线条；秋色莽苍，白云无垠，雁字成行，明月芦花，分明是不可言说的书境。

有一天，他蓦地感觉，怦然的心、手中的毛笔、容身的天地、变幻的四季，仿佛是一个整体。他顿时理解了庄子为什么会说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句话。

梭罗行走在瓦尔登湖的四周，行走在橡树、山核桃树、枫树、松树，还有一些别的树之间，他能从一片叶子看出春夏秋冬。云会从瓦尔登湖这儿带走一些东西，风也会把它们送回来。梭罗热爱这附近的山水，他觉得，这片土地，几乎涵括着整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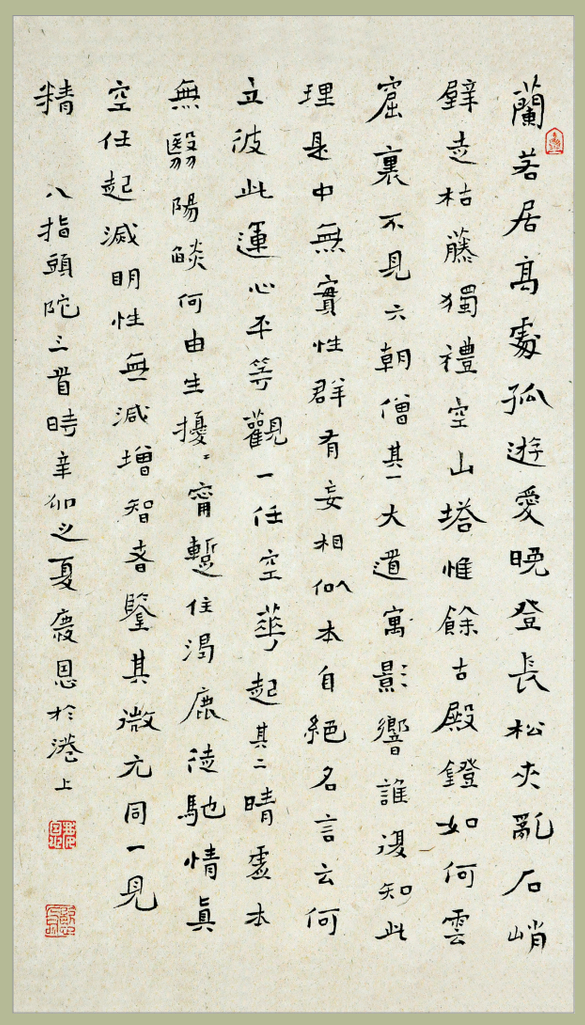
然而，梭罗也清楚，“世界并不限于这里。……我们应该像好奇的旅行家一样，浏览周遭的风景；而不是像愚蠢的水手，在旅行中，只顾低头撕麻絮。”“还是要听从古代哲学家的一句话，‘到你内心中去探险’。这才用得到眼睛和脑子。快把视线转向内心，你将发现你心中有一千处地区未曾发现。”

从海边的大洼地一折身，胡庆恩走进书法艺术的茂密丛林。他发现，一本本安安静静的碑帖，其中藏着一个博大精深的世界。历代优秀书法家及其风格，简直就是一株株的大树。

王羲之循法度而慕自由，仿佛枝干挺拔、叶形奇美的银杏；颜真卿结体宽博，如同磊落雄浑的古松；怀素草书连绵起伏，好比大风吹动的垂柳枝；《好大王碑》率真无邪，好似古柏伸展的虬枝；魏碑天真朴拙，形近以无用而得天然的樗树；唐人写经细腻委婉，迹若新生的茂密幼林；柳公权斩截瘦硬，如挺拔收束的水杉；苏东坡用笔欹倾而姿态横生，似临崖而立的倔强矮松；黄庭坚笔墨跌宕，枝柯张扬如山核桃树；董其昌飘逸妍美，像浓香四溢的丹桂；赵孟頫书写注重韵律，动静舒展如白皮松；米芾用笔出人意外，如爬墙老藤突然转折；王铎重墨参差错落，像阳光在大地上画的梧桐叶影；启功秀挺俊美，如迎风而立的白杨……

那片海边洼地不再贫瘠苍凉，这些枝繁叶茂的大树，既为他遮风挡雨、提供庇荫，又为他把丛林中隐秘的道路显现出来。在毛笔与宣纸的亲昵中，他发现，水墨是有深情的；书法线条，竟然简单而馥郁，孤独而芬芳。

天快亮了，梭罗开始他黎明时该做的工作。“我拿起斧头和桶出门找水去。曾经水汪汪、微微颤抖的、能够反映每一道光和影的湖面，现在冻结着一英尺、一英尺半厚的冰，上面还积了一英尺深的雪。……我先是用斧头穿过一英尺深的雪，然后又穿过一英尺厚的冰，在湖面上打开一个窗。用桶盛水之后，我向下面的世界张望了一眼……我看到，天空在我脚下，正如它在我头顶之上。”(梭罗《瓦尔登湖》)

手握毛笔站在书桌边面对宣纸的他，就像手提斧头站在瓦尔登湖畔面对天空与大地的梭罗。书桌上摊开的宣纸，对于他，既是脚下的大地，又是头顶上的天空。

天快亮了，我与胡庆恩才想起要睡觉。他放下笔，倒在床上沉沉睡去。收拾书桌时，在他打开的《赵孟頫书〈赤壁赋〉》册页上，恰有“不知东方之既白”七个字，映入我眼。